

新中国建立前后临汝县的政治经济形势

◆李翔宇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，1947年11月1日至1948年1月2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陈(赓)谢(富治)兵团第九纵队二十六旅七十六团、七十八团和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，先后3次解放临汝县城。1948年3月彻底打垮了国民党在临汝的驻军和地方保安部队，解放了临汝全境。1947年11月24日，在县城西南杨楼镇附近的和尚庙村建立了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，王武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领导任命为县长。1947年12月，中共豫陕鄂五地委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临汝县工作委员会，王云清任中共临汝县委书记。

为了尽快搞好临汝县的政权建设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组织生产建设，1948年以后，上级党委多次从老解放区为临汝县选派干部，输入领导骨干，以加强临汝县的组织领导工作。1948年4月和8月，中共豫陕鄂五地委先后把李国义、苏志高、张英仁、刘振邦等10余名山西老区干部及张夺锦、张光汉等18名河北老区干部调入临汝。1948年8月底，中原支队150余名山东老区干部又被调到临汝工作。这些老区干部到达临汝后，充实和加强了县、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。1948年9月，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撤销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汝县委员会，同时，调整、充实和加强了各区、乡领导班子。全县人民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积极投入剿匪反霸斗争，建立村级人民政权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。

刚刚成立的中共临汝县委和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，面对的是国民党黑暗统治所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，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和严重的经济困难。在政治上，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、残余势力、地主恶霸、土匪、反动会道门头子还在负隅反抗，

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。土地改革运动刚刚开始，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或正在建立，基础十分脆弱，特别是村级政权，有些还直接掌握在坏人手里，他们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内外勾结，里应外合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，妄图颠覆人民政权。1949年3月15日，以土匪头子刘金岳、郭老六等人为首，勾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坏人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，在临汝县城西北部一区和五区的陵头、安洼、夏店等地区，煽动组织土匪暴乱。暴乱匪徒先后围攻一区政府及王堂、申坡乡政府，枪杀了底东乡指导员杨树德、申坡乡乡长范中光及通讯员三位同志，破坏了一区区政府和6个乡政府、21个村农会。4月29日，六区(小屯)毛庄村，混进村农会担任农会主席的土匪杜套、民兵队长杜辛保与红枪会头目刘明升等人勾结，纠集64人包围区、乡政府。这两次土匪暴乱立即被县独立团指战员、县公安局干警和民兵平息。但是，残留在南北山区和一些地方的小股土匪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，有些不甘心灭亡的地主、恶霸等反动分子也不断制造反革命舆论，造谣惑众。所有这些，使刚刚获得解放还不十分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又蒙上了一层阴影，给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制造了重重困难。

在经济上，政府和人民群众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。刚刚解放的临汝县，伤痕累累，百废待兴，原来就少得可怜的工矿企业，在国民党溃逃时多数遭到破坏。临汝县的外地商人，在战乱中大部分逃离临汝。县城除一些零星摊贩以外，大的店铺寥寥无几，而且经营惨淡，濒临关门倒闭。农业凋敝，农民辛劳一年，上交苛捐杂税和地租以后，所剩无几，被迫外出逃荒者不计其数。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，

滥发钞票，导致通货膨胀，物资奇缺，使人民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。1945年以后，在临汝县流通市场上，国民党发行的钞票相当于抗日战争初期的360倍，物价比抗日战争前上涨3000多倍。100元“中央票”抗日战争前可以买两头牛，1947年只能买1斤煤。1946年以后，国民党发行“美金票”，1元“美金票”折合原来的“中央票”20元。后来又发行“金圆券”，1元“金圆券”折合“中央票”300万元。由于货币无限制的贬值，造成人民生活极端贫困。城市工人失业，农村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，农民衣食无着。不论城市和农村，都有为数不少的嗷嗷待哺的饥民。临汝解放以后，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，1950年又遇上抗美援朝战争，全县人民担负着支援前线的艰巨任务，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全县人民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
面对尖锐的政治斗争和严重的经济困难，中共临汝县委、临汝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，克服困难，经受住了各种考验，满怀信心迎接挑战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发展经济方面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

1948年4月，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迁至县城，并先后在全县建立8个区政府。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，1948年9月又调整为12个区人民政府。1949年10月以前，临汝县县直机关的财粮、支前、教育、司法、公安、工商、银行等职能部门及各区所辖乡政府，也都陆续建立起来。

县、区人民政府建立以后，县委把建立村级政权组织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县委和各区党委先后组织武装工作队和工作组，深入农村，发动群众，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，建立村级政权。工作队入村后，一方面，认真深入地向贫苦农民和各界群众进行三个方面教育。一是进行政治教育。利用多种宣传形式，向群众宣传共产

党、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，宣传共产党、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，宣传解放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派来为穷人打天下、谋幸福的子弟兵，宣传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，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，打倒恶霸地主，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；二是进行阶级教育。走访贫苦农民家庭，召开各种会议，发动群众诉苦水，挖穷根，忆苦思甜，牢记血泪仇，逐步树立正确的阶级观；三是进行政权教育。让群众认识穷人要想翻身得解放，必须掌握政权，建立农民协会。另一方面，工作组从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入手，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。通过诉苦，发现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，经过培养教育，使他们成为骨干，再由这些骨干去串连发动其他贫苦农民。通过上述的工作，使广大贫苦农民逐步觉悟起来，许多贫苦农民积极要求参加农民协会。1948年底，全县分三批建立起500多个村农会，吸收农会会员5万多人。

1949年1月6日，临汝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，与会代表913人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正式建立了临汝县农民协会，选举李砚农为县农会主席，霍华章、史长林、管金斗为县农会副主席。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前，临汝县的县、区、乡、村人民政权全部建立起来。

县、区、乡、村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、健全与日益巩固，标志着临汝县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基本的胜利，在临汝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。



汝之瑰宝

西周叔良父青铜匜

◆刘孟博

叔良父青铜匜，是汝州市汝瓷博物馆的馆藏珍贵文物之一。1980年出土于小屯镇朝川村，当时村民在挖土时意外发现该文物，后被文物部门征集入馆。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意识薄弱，文物工作人员并未对文物发现地进行科学考古，其属于墓葬还是古代窖藏，已不得而知。

叔良父青铜匜，长74.9厘米，流尾长26厘米，重量1.65千克。上沿破3.3厘米×1.5厘米，上沿裂纹1.8厘米；腹破洞：2厘米×0.5厘米，3厘米×2.5厘米，0.8厘米×0.8厘米；底破洞1厘米×0.8厘米。口呈椭圆形，短流，腹部饰三条弦纹，沿部饰一周象纹，后附一兽形鬃，下附四涡纹扁足。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两行，共22字，经专家辨识解读为：“盥大正叔良父作淳匜，其眉寿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”。该匜从器形、文饰和铭文字体看，当属西周晚期，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，为国家二级文物。

匜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礼器之一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有“奉匜沃盥”的记载，沃的意思是浇水，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，“奉匜沃盥”是中国古代贵族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，属周礼的一种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的：“进盥，少者奉盥，长者奉水，请沃盥。盥卒，授巾。”就是行沃盥之礼时，年少的人端着盘子，年长者给客人倒水，洗完手后由侍者递上帕巾擦拭双手。

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，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，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，前有流，后有鬃，为了防止置放时倾倒，在匜的底部常铸接有三足、四足，底部平缓一些的无足。早期匜多为青铜制作，汉代以后开始出现匜金银器、匜漆器、匜玉器等。近年考古发现，在西周中期以后，流行盘盥配合使用，西周晚期后，则多为盘匜配合使用。战国以后，沃盥之礼渐渐废除，盥亦被“洗”替代。

周代金文常见以国族名或职务与家族排行来作为人名称谓，该器铭文中的“大正叔良父”即是其例。“大正”为官名，西周、春秋时期称执掌国政的正卿大臣。《逸周书·尝麦》：“众臣咸兴，受大正书，乃降。大史·刑书九局以升，授大正。”《书·周命》：“予命汝作大正，正于群仆侍御之臣。”《蔡沈集传》：“大正，太仆正也。”“叔良父”为作作者，表明其家族排行在第三和倒数第二之间，良父为其字。在金文人名称谓中，名往往直接与氏名、家族排行连缀使用；字也常常与氏名、家族排行连缀，多称为某父，而“父”，则是对有才德男子的美称。

老虎拦赌

在山顶村至今还口传着老虎拦赌的故事。相传王氏夫妻在神鸟引领下来到打虎坪村后，开荒种地、引水浇地、勤俭持家、繁衍子孙，日子过得滋润起来。王氏夫妇心地善良，自从二人上山后，不但自家不打虎豹等动物，而且还劝阻前来围猎的人。夫妇二人的善心和行动感动了老虎、豹子等动物，这些动物从不伤害人和家畜，也不糟蹋庄稼。打虎坪山上人和动物和谐相处，相安无事。

光景好了，吃穿有余，王老三的手就痒了，心里就再次涌起了到山下的夏店街赌一把的念头。一天夜里，王老三趁妻子熟睡之际，偷偷携钱下山。刚到山东梁下的一片洼地里，从林子里窜出了两只老虎拦住了去路。王老三东躲西闪，累得满头大汗，终究寸步难行。王老三大怒，折断一棵栗树，挥舞着开道。一只老虎身子一缩乘机钻进他的胯下，驮起他向村里跑去。王老三还没愣过来，就被驮到了家门口，惊醒的妻子看到眼前的情景惊呆了……

王老三对妻子说：“看来赌博真不是什么好事，连老虎都拦挡我不让赌博。从今后我就死了这颗心！”说罢抓起一把菜刀剃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拇指头，终生不进赌场。

来源：《汝州民间故事》

民间故事



龙行龘龘

前程翯翯

王志斌 摄

他叫张延生，目前在上海是一家企业的老总。三十年前，因为种种原因，他离开汝州外出谋生，一直没有回过老家，经过多年打拼，如今小有成就。

他出生的汝州，有百余万人口，地处豫西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。

他在城区中大街长大，在他的记忆中，汝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个老样子。

房子大概都是四五层的样子，繁华的地方就是三纵三横，半天就可以把这个县城走一遍。环顾四周路上的人，大部分他都认识，最繁华街上的店铺四五年才会更新一两家。

万万没想到，今年春节回家，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汝州，看到了一个县城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有一些变化，让他仅从明面上就能看到，那就是——城区在扩张。

在很多的传统老城区的外面，一块块相对完整的区域进行完整开发构建出了一个新中心，比如汝州的东城、南城。和老城区不一样的是，这里铺设了更多的快速道路，构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高楼，这些高楼包括星级酒店、商品房社区，以及集中性商业区，都在不断完善中。

这一切都在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在发展，这样的配置很快地吸引这里的人口回归，老城单核的结构开始被打破。另外他看到，新中心依然在腾地，在建设，在升级，成为一个城市更强的聚合体。

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能够想象出一个县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那一部分，过去的小县城而已。但是除了这些大开大合的背后，他花了一整



◆李晓伟

天时间把这个城市用脚走遍之后，他认为，那些底层的变化才最有意义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听到各种关于一个城市因为高铁因为地铁带来的各种改变。但是如果一个县城没有高铁、没有地铁，甚至公交车体系都没有的时候，这些基础设施应该怎么做？

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，没有公交体系那就建呗，这不都是一个城市最基础的部分么？但是他在老家看到的是，直接跨入公交体系，并构建起了自己的“自行车模式”，公共交通系统齐头并进，不断扩新。共享单车模式，应该是颇具县城场景的交通工具了，现在互联网的触角伸进来，就直接共享化了。且共享自行车在这里的渗透率非常高，因为相对一线城市来说，县城实在是太小了。

这里的出租车起步价一直是6块钱三公里，以前的老居民打车，基本上没有超出过这个起步价。正是因为这样的物理距离，大家热衷自己骑着电动车出行，几乎是人手一辆电动车。这一套体系的存在，才算是真正意义上重构了一个县城的出行体系。

虽然这一切看上去没有什么高大上，但却真实地实实在在地在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。

城市在扩容的同时，老城本身也发生着改变。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四五层的矮旧建筑，已经全部进行了统一的立面翻新和着色，那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栅栏，其实就是空调外挂机位。道路也被修缮和改变，增加了不少的公共厕所以及分类垃圾桶。另外，县城里一些破旧的小街小巷，经过政府统一的翻新后，焕然一新。当然，一些夹杂在繁华路段的老旧小区也得到了修缮和保护。

精细化管理，这是让他最受感触的地方。虽然房子建筑都还是那种老旧的状态，但正如重构的地下网络一样，市政管理也进入了升级精细化阶段。在网格化内的住户，都有一个政府部门的直接对接人，这个对接人的头像和联系方式就直接公示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，包括各个对应资源的联系方式都直接公开。这种模式看上去很粗放，但却很直接有效，特别适合县城。县城的管理模式，与一二线的城市有很大不同，政府直接走到百姓面前脸贴着脸的对接，在这个小城显得无比高效和有用。

县城虽然比不上大城市，但是管理的颗粒更细，各个社区都进行网格化管理。所以，如果换个视角来看待这个县城，会发现

在那些大开大合的建筑的背后，政府力量、社会力量、互联网多重维度的渗透，让这样的小城呈现出一股不一样的勃勃生机。

因为城市扩容了，意味着地理边界开始扩张了，所以除了短途的自行车，出租车、公交车也开始大行其道。叫车也更方便了，终于有了打车破起步价的经历了。喝醉了酒，也可以随时叫代驾了。

这个城市的商业开始升级了，集中性商业里也出现了一些网红品牌以及潮流品牌。整个城市似乎一口气就直接跨过了转型的阵痛，迅速进入良性的雪球效应。这样的规模效应，很多时候都会让人意外，却激发出惊人的能力。

人们之前对于县城的担忧，无非是城市面貌差，没有好的产业以及留不住人，但是在政府、互联网、民营企业三方的合力下直接进入跨越式发展，而这三方的合力其实是有个契机的。都说一个城市总有各种力量在牵引，这些力量日常游走于寻常百姓看不见的各个角落，需要被规划和管理，而在某个合适时候，这些力量可以在同一时间同时爆发，从而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把城市抬着往上走。

大年初一，他和家人去绿洲广场看了《热辣辣

烫》，电影院里全部满座。《热辣辣》这部电影几天就破20个亿的票房，我们不去讨论这部电影好看与否，但是这部电影目前正朝向上的规模去了。这件事几乎重塑他对世界电影业的认知，好莱坞每年最好的电影在全球票房才将近10亿美元，我们一个国家就能够无限接近这样的能级。这样的票房业绩并不是靠着几个一二线城市产出了，靠的是无数个像汝州一样的小县城输出的惊人消费力。

能够有消费升级不是靠的高大上的概念，依赖的是底层结构的升级让每一个个体对这个城市有信心，对未来有盼头，然后才是大家愿意消费。

全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县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……当年逾花甲的他得知汝州获得这么多“国字号”荣誉时，情不自禁地感慨：老汝州变成了新汝州，这些年，汝州变化太大了，变得我不敢认了。

是的，像他一样，一个站在汝州城区中心位置的青年广场——汝州剧院广场——绿洲广场，或者以后任何新的广场……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变化。

印象里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青年广场就是很大一个广场了，他无数次在这个广场边上和小伙伴打架、嬉闹。这次他回来看到，虽然广场不断变迁，周围很多都在变了，房子拆了一些，改了一些，人也变了不少，但是，这样的广场一直都在，而且越来越美了，越来越开阔。

“老家汝州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，真好。”在家过了一个年，张延生对汝州的变化，意犹未尽，赞不绝口：“以后我要多回来，为咱们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。”